

【主题演讲】

17 世纪东亚历史的发展及其特点

—如何认识 17 世纪世界史中韩国历史之流变—

赵 珧（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委员长）

[原文：韩文 翻译：金罔泰(高丽大学)]

【摘要】

研究世界历史的一些学者们将 17 世纪定义为危机时代。到了 17 世纪，当太阳的黑点爆炸，冰冻圈降至约 2 摄氏度时，地球遭遇低温现象。有人认为，由于这种异常低温现象，导致地球上发生了饥荒和瘟疫等各种灾异，加之战争的发生，人类历史面临一个大的危机。学术界将这种观点特别地称为“17 世纪危机论”。从世界史的角度，十七世纪被认为是“危机的时代”。在亚洲史领域，也有一些基于危机论的研究。可是，我们若想详细查看东亚史的展开过程与情况，这种理论方法在此未必适用。朝鲜在此时期经历了战乱，国内有非常强大的呼声主张“重建论”，欲从政治、社会、思想史等各方面建立新结构和新机制，以此复兴这个国家。这股势力非常活跃，积极讨论理想社会形态，提出多种改革方案，并最终导致了朝鲜“实学”的产生。朝鲜对新秩序的这种思考，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引领了时代的走向，形成了内部的长效讨论机制。此外，它也使得朝鲜在与邻国的外交对应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与多样。这是朝鲜能够克服危机、步入新时期的原动力。我相信，若以本国史和对外关系史的双视角来看待这一时期历史，中国史和日本史也可以勾勒出更加生动的历史面貌，并取得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成果。

1. 绪论

“17 世纪危机论”是通过研究欧洲历史开始被提出的，并指出这个理论亦适用于亚洲，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然而，这个“17 世纪危机论”是否适用于东亚历史的发展，还待于研究。本文旨在阐明以朝鲜、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 17 世纪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朝鲜历史的特征。朝鲜王朝、明朝和日本室町幕府成立时间相近，在“朝贡册封体制”的国际秩序下建立关系。从 14 世纪后期到 16 世纪后期，三个国家和平相处，未发生冲突。

然而，当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宣告对外侵略时，东亚和平开始出现裂痕。丰臣秀吉于 1590 年接见朝鲜通信使后，要求朝鲜国王配合日本入侵明朝。对朝鲜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要求。丰臣秀吉却完全不考虑以往的国际关系，提出了破坏性的要求。于是，1592 年 4 月，丰臣入侵朝鲜。

朝鲜向明朝求援，明朝派遣部队支援。丰臣秀吉意识到无法迅速战胜对手，便来到讲和谈判桌上。明朝根据传统观念，将丰臣秀吉册封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接受了册封，但主张为了结束战争，应该从朝鲜那里获得“战利品”，这导致了日本的再次入侵。这就是丁酉再乱，丁酉再乱因他的死亡而告终。

另一方面，壬辰倭乱快要结束时，女真族中的一个部族开始急速壮大。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建立后金国，随后自称皇帝，并把国号改为清。女真族两次入侵朝鲜，引发战乱。这两场战争朝鲜

败北，结果朝鲜和后金建立了君臣关系。后金最终取代灭亡的明朝，成为中原的统治者。

换言之，这一时期东亚历史急剧变动，中国明清朝代交替，日本德川幕府建立，朝鲜也在努力重建国家。一些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东亚世界解体”、“中国式世界秩序解体”，或将其作为“17世纪危机论”的一环来解释。然而，这种视角是否妥当，有必要重新审视。

2. “战乱时代”、“两乱”与“16-17 世纪”

韩国史学界把朝鲜时代区分为前期和后期，即把 15 世纪和 16 世纪视为朝鲜前期，把 17 世纪到 19 世纪视为朝鲜后期。把朝鲜历史划分为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点，是基于日本入侵朝鲜的壬辰倭乱和丁酉胡乱，以及女真族侵略朝鲜的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将日本和女真族入侵朝鲜定义为“两乱”，由此试图划分时代界限。

朝鲜史学者一般将“两乱”以前时代定义为朝鲜的发展时期，将“两乱”以后定义为朝鲜的艰难时期，并且夸张地描述了“两乱”的实际受害情况。此外，还出现了“内在发展论”，即认为在后期朝鲜克服被害的困境，在急速变化中向近代发展。

然而，“两乱”的名称是否合适尚有疑问。首先，壬辰倭乱和丁卯、丙子胡乱之间有三十年的间隔。两次战争在形式上亦差异巨大，也就是说，倭乱是一次“全面战争”，其中有 10 万余名日军进入朝鲜，蹂躏全境，是与朝明联军对垒的“全面战争”，而胡乱是一场“有限战争”，清朝旨在短时间内降服朝鲜，从而集中力量与明朝开战。然而，以“两乱”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理由在于为了把对朝鲜人力和物质造成巨大破坏的壬辰倭乱与在思想方面给朝鲜带来很大冲击的胡乱相提并论。

虽然“两乱”这个名称通常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但把朝鲜历史划分为前期和后期的基点几乎都是壬辰倭乱，这是因为给壬辰倭乱赋予了划时代性质的结果。也就是说，朝鲜因倭乱损失巨大，短期内难以复兴。然而，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研究对朝鲜受害程度有很多夸大其词。倭乱结束后不久进行的土地调查数值，作为战乱后“与民休息”政策的结果，被低估了。当我们参考这些最近研究结果时，会发现以往的壬辰倭乱研究存在不少问题。

在韩国史的研究过程中，对 17 世纪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史研究。这是一些从关于东人和西人为代表的派系体系建立等的新视角展开的研究。这里可以把派系政治的确立看作朝鲜王朝统治体制的完善。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再造论”等的提出，是试图从政治和思想上克服国家危机的一个动向。

此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17 世纪危机论”这一世界历史潮流相呼应，人们试图将“小冰河期论”应用于朝鲜王朝历史的研究上。这是以朝鲜半岛无法避免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为前提而提出的。事实上当时朝鲜半岛饥荒和瘟疫流行，由此出现许多问题。然而，克服这种危机的努力从各方面并行展开。

17 世纪韩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家族制度”。从 17 世纪初开始，长子继承权强化，两班（朝鲜时代最高级的社会阶层）家族四代奉祀的普及，过继养子盛行，以长嫡子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制度得以确立。而且，在婚姻制度中，男方在女方家（妻家）生活的时间开始减少，女方在婆家生活的方式逐渐普及。社会、经济方面对女性的差别对待，开始在两班统治阶层中扎根。这也是一种应对社会变化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推动变革的机制。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观点是主张摆脱以往的时代划分论，从社会经济方面关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同质性，也就是所谓的“朝鲜中期论”。该研究关注的是在壬辰倭乱后，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两班在朝鲜牢固地建立了统治地位。在壬辰倭乱的特殊时局下，两班们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在战后恢复过程中掌握了主导权。他们采用的改革主义理论，以礼制秩序的建立和“与民休养生息”为代表，例如“乡约的普及”和“朱子家礼”的施行。这样的改革论经过仁祖反证以后有一段时期实行

了国家主导改革论，但是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再次变为自律性的扩大政策。

3. 思想变化和克服危机

面对危机，朝鲜从各方面提出了复兴理论。17 世纪以来朝鲜思想界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礼的发展。当时的礼，不仅限于以红白喜事为中心的仪式，礼学者们将礼的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对国家制度的讨论上。这样的礼对加强国家的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作用。

以性理学思想为背景的官僚们，在 17 世纪大同法和 18 世纪均役法的施行等国家制度的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大小变通论。大变通论主张超越朝鲜王朝现有的制度和惯例的根本性变通或改革。与此相反，小变通论则主张恢复现有制度和惯例所提示的原型，来健全国家秩序。这样，性理学自 17 世纪以来一直作为一种强化的统治理念继续发挥着作用。

于是，在 17 世纪朝鲜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思想界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实学思想的出现为代表。作为新的思想潮流的实学思想，是指朝鲜 17 世纪以后在社会上出现的现实性、改革性的思维形态。实学思想虽然没有正面反击性理学，但是它要克服历来性理学者所提倡的朱子唯一主义，而且，该主张立足于先秦时代原初儒学的变通论。他们主张的变通论，大体上带有大变通论的性质。因此，实学思想是 17 世纪以来朝鲜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产物，作为取代或改革性理学的经世论，登上了历史舞台。

实学产生的背景，首先是内在因素。社会、经济方面的农村社会变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因素，首先最重要的是它对以性理学为本位的朝鲜思想界形态的发展变化起了很大作用。对 17 世纪战争以后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经世论，性理学的经世论在合理地应对之策方面显示出了其局限性。所以，朝鲜思想界开始提出既不拒绝性理学的学术风格，又摆脱认为只把朱子性理学视为唯一的立场，开始提出立足于新基准的新的改革性经世论等。

实学发生的背景，亦不能排除外来因素。17 世纪，朝鲜在丙子胡乱中惨败，为了挽回局面，朝鲜在各方面做了努力。这时出现了“蛮夷”清朝代替明朝统治中原的状况。朝鲜思想界在重新审视传统正统论和华夷论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继承中华意识或朝鲜中心主义。

朝鲜中心主义对实学学者的自我觉醒也有一定影响。实学家也重新审视正统观念和华夷论，这对重新确立实学家自己的思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实学者们的改革论基于先进的儒教思想，它的思想涉及到王道政治论、权力结构改革论、官僚制度改革论、科举制度改革论、军事制度改革论、土地制度改革论、工商业振兴论、社会改革论等多方面。而且，对儒学思想的研究或对外国的认识和历史观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4. 朝鲜 17 世纪的外交

1598 年 11 月，日本军队全部撤出朝鲜。1600 年 9 月，明军也撤出朝鲜。朝鲜需要重建国家，同时还需要重新确立外交关系。在侵略当事国日本，德川家康掌握了实权，批判丰臣政权的对外政策。德川家康因政权的正统性不足，所以有必要得到“外国”政权的承认。于是，德川家康积极邀请朝鲜派遣外交使者。发出外交邀请的是几年前侵略自己国家的日本，而掌握政权的人则是表明壬辰倭乱时未参与侵略的人物，为此朝鲜苦恼了几年，也特别关注了日本政权的状况，终于 1607 年决定派遣使者。

明朝则苦于女真族的不断壮大，以壬辰倭乱时的“再造之恩”为由，要求朝鲜在军事方面共同应对。朝鲜不知所措，光海君和仁祖政权都在同样问题上苦无良策。迅速壮大的后金政权——清，先是入侵朝鲜，建立了兄弟关系，然后发动丙子胡乱，建立了君臣关系。明朝和朝鲜的关系被强行切断。1644 年清朝进入北京，成为中原统治者。如何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朝鲜陷入更深的苦恼

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虽然取消要求朝鲜派遣援军的要求，但过去为了共同对清作战曾有过提议。在朝鲜，也有像赵綱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内在的对应和外在的对应互动。在丙子胡乱中，被派到日本的使节曾从“回答兼刷还使”更名为“通信使”。

17 世纪被称为“危机时代”。每个国家如何应对这一时期呢？如上所述，我只探讨了朝鲜方面的情况。但是，朝鲜的应对方法不只取决于内在要素，还需要审视变化和引发变化的关系，而且同时还需要观察它对各国内在性变化带来的影响。

5. 结论

17 世纪的朝鲜，在战争危机之后提出了强有力的复兴理论。在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为了挽救国家，促发了一个创造社会新机制的趋势。各方积极讨论了理想的社会改革措施，并提出了积极的改革建议，这一趋势表现为“实学”。创造新秩序的苦恼，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牵引着时代，造就了一个长期的争议性结构。此外，外交方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法。

这变成朝鲜克服危机并进入新时代的动力。因此，17 世纪是危机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变化和发展时期。在这里，朝鲜的 17 世纪史与西欧史学中的 17 世纪危机表现出一定的差别。

在韩国史方面，对 17 世纪史，发现需要从新视角来研究的领域有很多。在历史发展的大原则下，我们将必须重新加以定义 17 世纪史的个别事件所具有的意义。

如果我们在日本史和中国史的研究过程中，同样从本国史和国家关系史的视角来审视 17 世纪这一时代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更接近事实。